

青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青縣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0308

范仲淹

青县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王度支

王度支

癸亥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青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目 录

抗战初期的青县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和抗日民主政府

.....	孙观义 (1)
我在日伪据点搞敌工	杨汝涛 (10)
日军进城前后	孙观义 (27)
九一八事变见闻	张文房 (35)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回忆	邢汝义口述 李华静整理 (38)
我去伪满洲当华工	赵金铭口述 孙观义整理 (47)
丧生于德军之手的知县沈巖初	(52)
历史上马厂兵营的驻军	孙观义 (55)
青县解放前县城的工商业	彭维勤 陈家美 孙观义 (58)
清末民初在青县流通的货币	陈家美 (68)
青县评剧团	陈文升 耿建华 (71)
解放前的医药及疾病状况	彭维勤 孙观义 (87)
青县名中医杨臻轩	杨植正 (96)
跤坛高手张连生	张俊岭 (104)
宁世福	孙观义 (128)
青县六街公益旧事	彭维勤 (133)
短命权监安德海	孙观义 (137)
青县盘古庙	王汝芳 王锡英 (148)
张娘娘、娘娘宫、娘娘河考	孙观义 (157)

补白二则：周盛传开挖马厂减河 (86) 青县城池始末 (95)

抗战初期的青县各界抗战

建国联合会和抗日民主政府

孙观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日军在流河突破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防线，第二天即将县城占领。随后，伪治安维持会、伪东西南北四面团等汉奸政权和武装相继建立，并在盘古、辛集、杜林（原属青县）等地设立了据点或警察所。一时间，阴云密布，杀气腾腾，白色恐怖笼罩了青县。

东西两乡，日伪鞭长莫及。在乡的旧军官与地方士绅相配合，利用广大群众的抗战激情，以抗日保家为号召，纷纷建立地方武装。东有杨相如的自卫团，西有段春波的河（间）大（城）青（县）联庄团。但这些武装的成分比较复杂，特别是其首领各有各的动机，很多是企图占山为王，发展个人势力，以达不可告人之目的。

这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蒋介石终于接受我党主张，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进入全国统一的

军队序列。我党政军干部战士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敌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晋察冀边区成立，四月，冀中区成立。我县属晋察冀边区冀中区一分区。

冀中区党政军机关于六月间迁至任邱青塔镇。八月，军区司令员兼行政公署主任吕正操派八路军第三纵队十九大队（一分区一团）三个营来我县境内，打击敌伪，宣传抗日，收编民团，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解决了反动武装马廷范部后，收编“河大青”联庄团为冀中一分区独立一团，开往河间。同时，着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府。

九月，一分区派民运科科长尹痴生、干事惠世如和一个以刘志忠为指导员的武装小队来我县于远头（今属大城）北官厅一带开辟工作。他们一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一边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有文化的进步青年中物色对象，筹备建立冀中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青县分会（后称青县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简称青县抗联）。尹、惠二同志首先在北官厅培养了朱海峤、段维信二位青年。朱海峤出身富农，是事变后回家的北大学生。段维信出身中农，是青县沦陷后停学的青县师范生。他俩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便投身革命，协同尹、惠二同志到各村开展工作。在工

作中陆续培养选拔了段的师范同学大召官的宋永谋（晏塘）、后吴召的王昆仑（王涛）、木门店的张万蕙（继泽）、张连万（兴山），还有孝子墓在沧县二中上学回家的周凤惠、李家营曾在木门店小学当校长的李士驹、前仔仪曾当小学教师的张利祥等七名青年。十月间，我县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青县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在于远头宣告成立。主任朱海峤。当时下设三个分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主任王昆仑；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主任张万蕙；文教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会），主任朱海峤、李士驹。以后又增设了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

抗联建立不久，一分区又派来了战地总动员工作团。团长严镜波（女，原献县组织部长、妇救会主任）。成员有陈克镜（女）、武敏芳（女）、王泽峰（女）、彭晓悌、范良骥等。另随一有十七八人的武装小队配备工作。此后尹痴生等调走。工作团来到后，继续发展抗联，除吸收于远头的于志愚、于汝贤和里坦的陈丽云三位女青年建起妇救会外，还培养了大功的杨汝涛（文彬）、化家务的宋继江、白塔务的张宏如，野兀屯的张崇恩、后吴召的李兆民、王庄子的李明山、园里的张崇文等。组织逐渐健全，队伍不断壮大，这是我县第一批共产党

培养的来自各阶层的革命干部。他们和工作团的同志们并肩战斗，在本支黑龙港河以西，西沙河（子牙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开展活动。到各村贴标语，做演讲，宣传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号召广大群众“有人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还排练文艺节目搭台演唱。陈克镜在演唱《松花江上》时，想起自己被日寇杀害的在东北铁路上当段长的父亲，忍不住边唱边哭。他的演唱和感情触动了群众本来就忧愤苦痛的心，不禁也都抽泣起来，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工作团和抗联广泛深入的宣传，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抗联在各村发展基层组织，建立村的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同时，建设村政权和村武装。孩子们也组织起来，成立儿童歌咏队，大唱“叫老乡，快去把兵当，别等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老婆孩子遭了殃，快去把兵当”等歌曲。这时，上级已先后派延安抗大学生张甫和高力农、李力行等来我县建立抗日武装。抗联的同志们深入各村动员青年参军，动员群众献枪。虽然前不久很多青年已投入到独立一团，大部分枪支也被他们带走，但仍很快就成立了一支一百二三十人的青县游击大队（正

式番号为民国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十九游击大队)。张甫任大队长，高力农任参谋长，李力行任政治主任。下辖三个中队一个独立小队，分别由李凤亭(旧镇人)、袁宝玉(袁留保住人)、贾培箴(鹅庄人)、卞玉俊(卞召官人)担任一、二、三中队和独立小队的队长。一九三九年初，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来冀中抗战，一部到我县，还为其扩充了兵员。后又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姚有年(西冯村人)负责领导各村的自卫队(民兵的前身)。

抗联还为军队积极募捐，朱海峤动员父亲朱金凯将多年积蓄的一千八百大洋(银元)捐给了十九大队，起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虽然当时群众生活很贫苦，但捐献的热情非常高，每天都有大批款项经抗联转送部队。

为了培养骨干，建设干部队伍，工作团和抗联在于远头举办了民运干部训练班，从各村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学习。每村一两个三五个不等，全班共五十余人。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回家。

这时的群众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对日伪形成了巨大压力。

在建立青县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这一统一战线群团组织的同时，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抗日民主政

府也在筹建。早在八月“河大青”联庄团被收编时，十九大队就受行署之委酝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当时大队长李亚峰通过与收编后的独立团团团长王宝钧、参谋长王树权等协商，经行署批准决定将原联庄团的临时法院院长叶仲篪留下，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叶仲篪是王宝钧的妹夫，清末举人，曾任过国民党的沧县县长，事变后在天津住闲。因“河大青”无人能受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就把叶从天津请来，当了法院院长。叶仲篪任县长后，政府设在东蒿坡。但叶受不了艰苦生活，扔下大小婆儿一家在天津也不放心，只干了一个来月就告辞走了。随后十九大队又在西部大城县境内物色了一个县长，就是崔张吉村的崔宝琚。此人出身地主，毕业于天津法政学院，国民党员，曾在天津法院任职，沦陷后回家。冀中行署委任他为青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由他组阁，他欣然接受，便于十月间带领秘书张文华、财政科长田少芳、民政科长魏凤仪等八九个人来东蒿坡上任。跟他来的大都是在国民党官面上混过的人，而且都是大城县人。到青县后只吸收了厚召官的杨丕烈当书记员，因他跟崔宝琚论着有点亲戚关系。政府在东蒿坡驻了一个来月即迁至于远头，因此地离敌占区较远，比较安全。

此后又开始了区政权的建设工作。除运东杨相

如（1942年降日）控制区和铁路两侧敌伪控制区，将我们控制的西部划分为五个区。先建的五区（辖于远头、北官厅到几个营一带），区公所于一九三九年的一二月间在皮庄子成立。区长高庆波。高是长芦盐人，地主、乡绅，原为“河大青”的重要首领，改编时留在地方。区长以下有民政、财政等助理员。区也设有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四区（辖野兀屯、吴召，木门店一带）的区长，是木门店的张建侯。他曾在旧军队中当过参谋长，也是较有名声的人物。区公所计划设在木门店，正在落实。二区（辖儒林村一带）也在拟议中，区公所计划设在阁上营。

这个时候，形势变得有些紧张和严峻起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阵脚。一九三八年十月末敌人攻占武汉后，不得不改变其战略，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争重心移向后方。于是，前线日军源源向华北转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此后敌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扑灭冀中的抗日烽火。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两千余人，伪军二百余人从河间出发向东北方向扫

荡。我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游击大队奉命向辛集东南的几个码头一带转移（当时工作团和抗联的同志们多数都在原属青县的老生、杜生一带分散活动）。不料，当队伍快走到辛集时，发现驻沧县的汉奸队刘佩臣部百余人正开到辛集安据点。于是又调头向建国县的东羊庄一带转移。行军途中，一战士不慎走火，响了一枪。刘佩臣部发觉，立即开着三辆满载伪军的汽车追了下来。当时我游击队的装备很差，人多枪少，子弹缺乏，而且枪什么式的都有，有的还没有合适的子弹，只是一支空枪，不得不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因而决定游击队由张甫带领，政府由崔宝琚带领分头向南撤。游击队安全地撤到沧河路附近。崔宝琚一班人则如惊弓之鸟，被敌人吓破了胆，没有向南撤，而是奔西北大城去了。跑到西沙河，过桥到了留各庄，定了定神后，便自行解散，各奔东西。县长崔宝琚也带着县印回老家崔张吉去了。

出来扫荡的日伪军于四月二十八日被我一二〇师阻击，激战三昼夜，死伤八百余，狼狈退却。

在形势严峻恶劣的情况下，我县各路人马在河间皮乡屯集合，成立了以陈克镜为主任的青县战地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军政民组织（严镜波已调走），并且成立了青县战地工作团。团长王昆仑，

副团长杨汝涛，下设锄奸、宣传、农民、青年、妇女五个部，原抗联的多数同志成了工作团的成员。而后，全体返回青县境内，继续工作，，但没再设固定的驻地。

五月，冀中行署任命原行署视察员芦金堂为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原清苑县民政科指导员杨子争为政府秘书，原清苑县农会主任田致忠为青县农会主任，原行署人民武装科指导员杨振忠为我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他们一班人来我县后，重建抗日民主政府，设民政、财政、实业、教育四科。新政府没有固定的驻地，灵活机动，非常活跃。在新来干部和原有干部、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及全体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到七八月间，抗战局面不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不但加强了五区落实了四区，还又新建了三区（辖吴召以南，沧石路以北，王祥庄以西的广大地区）和一区（辖汤庄子、白庙、泗庄、胡店子一带）。抗联也重新建立，而且又建立了国民抗战建国联合会。人们的抗战热情越来越高涨，但斗争也越来越残酷和复杂了。

我在日伪据点搞敌工

杨汝涛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共产党八路军到我们大功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抗日工作。在抗战期间，我先后任大功村青救会主任、县抗联干部、战地工作团副团长、锄奸部部长，抗日民主政府实业科科长，三区区区长、游击大队队长等职。但干的时间最长的还是在敌伪据点里搞地下工作，前后将近四年。

遭逮捕，里坦据点卧底

1941年，由于我敌后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侵华日军“速战速决”的鲸吞政策未能实现，不得不回过头来顾及后方，在战略上转变为“治安强化”、“蚕食政策”。当时在青县的日军，极力招兵买马，扩充保安队、自卫团等武装，到处修岗楼安据点。同时，网罗地痞流氓，建立宪兵队、工作队、特务队，清查队等特务组织。真是岗楼林立，

敌伪遍地。他们四处出击，疯狂地“清剿”，“扫荡”，破坏抗日组织，捕捉我工作人员，环境日趋残酷。

当时我任青县三区区长，活动于沧河路南北一带。七月间，因发疟子请假在家养病，被本村富农沙永修发现，向里坦据点的伪军杜福祥部队告了密，被抓到了里坦据点。

据点里有我个亲戚叫李树通，他在敌人面前积极为我周旋。就在这时，青县抗日政府县长金铎同志给我写了一封密信，让他的堡垒户共产党员沙永昌送到里坦，利用敌人押我去吃饭的时候，趁机塞给了我。大概内容是：汝涛，你被捕我知道了，只要死不了，就潜伏下来，以后多联系。看完信，我非常激动，组织的信任和关心，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决心接受派遣，打入敌人内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时我们村的村干部（当时属忠我应敌的两面政权）就出面托杜福祥的表叔魏建堂为我说情。他是里坦的乡绅，很有点名气。结果他真帮了忙，并对我进行了担保。杜福祥知道我当过教员有文化，听说又能干，想让我为他效力，就对我说：“你的事也就这样了，反正你们也活动不开了，就在这儿跟着我干吧。”

一开始安排我当二大队的文书，主要管花名

册，抄写材料，给士兵发饷等。这个差事和头头接触多，了解的情况多，很利于掌握敌人内部情况。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我就假装死心塌地和他们一齐混，打牌、喝酒，有时还特意花钱请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对我就没有什么戒心了。为便于和我方人员联系，我又把家属接来里坦居住，做为密密联络点。到了1942年5月，杜毛虎（杜福祥的外号）又让我当了伪军与日本小队的联络员，负责向日本队部请示汇报。这样我又和日本人接触多了，常和他们打牌，来烟卷儿的，我故意输给他们，换取他们的好感。一来二往，又和他们都混熟了。这些，都是我开展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

建组织，瓦解争取敌伪军

1942年春，根据金铎同志的指示，开始慎重地物色对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我首先通过聊天了解伪军们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对时局的想法，及当伪军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是为了混饭吃，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还注意观察他们下乡催粮、讨伐时的具体表现，是真心实意地为鬼子汉奸卖命，还是敷衍搪塞得过且过。经过反复了解、考验，培养发展了六中队文书叶荫山和管催粮的于景涛为正式党员。还培养了军械主任马自强等一批积

极分子。连我一共有了三名党员，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就建立了党支部。我任支书，叶荫山任组织委员，于景涛任宣传委员。当时开会，主要是利用饭后活动的一段时间，以散步闲谈的方式进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情报，争取进步分子，分化瓦解伪军，伺机发动反正。

在这期间，我和金铎同志直接见过三次面。每次都是沙永昌给我送信儿，我就明着请假回家，暗地回大功与金铎同志会面，谈完工作再返回里坦。我将绘制的据点地形图，兵力部署情况，汉奸花名册等都交给了他。偷出来的500多发子弹，有的让交通员带走，有的我亲自交给了他。

原来我只与青县党组织联系，后来又跟大城县党组织接上了头。有一次我跟着汉奸队到大城郭庄去催粮，我召集群众讲了话。在这村的大城县区干部在暗中听了我的讲话，觉得有些不寻常，就让本村一个姓缴的把我叫了去，从此又跟大城党组织联系上，由一个名叫崔玉良的同志跟我接头，他再与任（丘）河（间）大（城）支队政委韩仰山汇报。我多次为他们提供情报，并几次把他们送来的宣传品扔到日本队部。那宣传品是用日文印的，装在一个小袋里，里边还装着牙刷、牙粉一类的小日用品和脆枣等食品。口袋外面还写着据点里日本人的名字。

后来才知道这是冀中反战同盟搞的。有一回还给我送去了一迭白布制作的标志，上边印着蓝字，什么字我记不清了，说是日军戴着它到我根据地去，可受到热情接待。我也把它都扔到了日本队部院里。与这批标志一同送来的还有一张委任状，是冀中反战同盟委员会发的，任命我为密抗团副团长，韩仰山为正团长。交通员把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里后就走了，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也没和韩仰山见过面。后来和韩同志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密抗团来了！”

杜部队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特别是上层更厉害。正司令杜毛虎和亲信军需主任刘锡臣相勾结侵吞公款，克扣粮饷，官兵们都不满，按他们的说法叫“喝兵血”。特别是副司令张玉光还受刘的外待，在钱上受卡，对他们更不满。汉奸跟日本矛盾也很深。日军专横跋扈，对杜部队瞧不起，不信任，可催粮、讨伐都叫他们打头阵，挡枪眼。杜毛虎为讨好日军，甘愿受制，可张玉光不服气，总想和日本人较量一番。终于在1943年夏发生了一场几乎闹翻的争斗。有一段时间，杜毛虎在天津治病，杜部队暂由张玉光负责，杜部队和日军的关系就更僵了，双方相互怀疑，处处提防。日军察觉关系越来越紧张，以为杜部队要搞掉他们，就向老百